

上品驢藥： 中國本草文本中的阿膠論述*

劉世珣**

提 要

中國主流本草文獻幾乎都將驢藥列入「獸部下品」，但驢藥中的阿膠因「無毒」、「輕身益氣」等特性，自成一個藥物分類範疇，歸入「獸部上品」，其特殊性不言而喻。歷代本草書和方書記錄了不同時期人們對阿膠的觀察以及認知上的省思，當中有關黑驢皮、阿井水等製膠要素及其對應療效的論述，並非從藥物所含成分、歸經與臟腑辯證理論分析解釋，而是從自然宇宙論的角度切入探討，其背後涉及模擬比類與陰陽五行學說，以及人體小宇宙與自然大宇宙之間的對應與穩定關係。惟相關論述並非一開始即是如此，而是有其發展和變化的過程，且不同階段的論述，各有其重點與特色。此外，本草方書中辨識真偽阿膠的文字敘述，往往涉及視覺、嗅覺、觸覺等人類的主觀感知，這類感知時常被當作甄別真膠和偽膠的重要判準，形成一種辨藥知識的傳統。綜觀這些阿膠的文本記述，彼此之間既相互傳抄，亦相互質疑，甚至出現挪用、複寫，進而形塑自己是論述原創者的現象。然而，當中透過模擬比類與陰陽五行學說解釋製膠要素，很有可能僅是宋代以降本草學家的一種宣稱和論述方式，醫者實際使用阿膠治療疾病時，未必依然注重此原理原則。

關鍵詞：阿膠、黑驢皮、阿井水、真膠、偽膠

* 收稿日期：2023年9月1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5月3日
本文曾發表於“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Frankfurt, Germany, August 21-25, 2023)。撰寫期間，承蒙陳秀芬教授給予諸多指點與建議，復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中國各種本草文本中，不乏關於以驢入藥的記載。這些本草文獻幾乎都將驢藥列入「獸部下品」，但是，當中以驢皮製成的阿膠卻被獨立出來，自成一個藥物分類範疇，歸入「蟲獸上品」 / 「獸禽·獸上」 / 「獸部上品」，其特殊性不言而喻。¹ 儘管如此，「膠」並非一開始即作為藥用，《周禮·冬官考工記下·弓人》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² 顯示「膠」最初是作為弓弩的材料，為重要軍事物資。爾後，經過先民口嚙身受和經驗累積，逐步發現其醫療價值，「膠」遂成為傳統藥劑的一個類別。³

膠劑出現在醫藥文獻中，首見於馬王堆漢墓《五十二病方》：以水煮冬葵子一斗，瀉取其汁，再加入膠一把半，熬煮至三分之一的濃縮份量。⁴ 惟在《五十二病方》中，尚未出現「阿膠」此一名稱。「阿膠」之名見於醫藥典籍，目前最早可追溯至東漢《傷寒論》「黃連阿膠湯方」與《神農本草經》「阿膠，味甘，平」等記載；後來，南朝梁《本草經集注》亦記載阿膠除了作為藥用之外，也可以當作書畫用顏料與黏合材料。⁵

值得注意的是，阿膠起初並非以驢皮製成，而是煮牛皮做之，之後才逐漸改以驢皮做膠。而且，儘管宋代以來，寇宗奭（生卒年不詳）《本草衍義》等本草

1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卷6，〈蟲獸三品·上品·阿膠〉，頁400-401；(唐)蘇敬，《新修本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冊989，卷15，〈獸禽·獸上·阿膠〉，頁8；(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宋版），卷16，〈獸部上品·阿膠〉，頁14。

2 《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收入（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冬官考工記下·弓人〉，頁658。

3 吳亞蘭、許霞，〈膠劑的歷史發展〉，《中醫藥臨床雜誌》，2018年5期，頁870-872。

4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頁454-455。

5 (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編，(金)成無己注，《注解傷寒論》，收入《古今醫統正脈全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冊5，卷6，〈黃連阿膠湯方〉，頁5；(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6，〈蟲獸三品·上品·阿膠〉，頁400。有趣的是，除了作為軍事物資、藥用、書畫用顏料以及黏合材料之外，「膠」自宋代開始，亦常作為製墨的原料。如宋人晁貫之（生卒年不詳）《晁氏墨經》記載：「膠不可單用，或以牛膠、魚膠、阿膠參和之。」到了清代，阿膠甚至成為說唱表演者的行頭之一。如清人李斗（1749-1817）《揚州畫舫錄》描繪清代揚州說唱藝術時提到：「清唱以笙笛、鼓板、三絃為場面，貯之於箱，而攪毬、笛床、笛膜盒、假指甲、阿膠、絃線、鼓箭具焉，謂之傢伙。」詳見（明）周履靖輯刊，《夷門廣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金陵荊山書林刊配補影鈔本），〈墨經·膠〉，頁4b-5a；(清)李斗，《揚州畫舫錄》，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11，〈虹橋錄下〉，頁254。

書多不斷強調製做阿膠時，以「黑」驢為佳；⁶但明末清初醫學家陳士鐸（1627-1707）卻在《本草新編》一書中指出，山東東阿縣的阿井水與驢皮本身才是製膠的關鍵所在，而非一定要用「黑」驢。⁷這兩種論述著重之處各為何？為什麼會有此種論述上的轉變？箇中歧異之處，值得詳加探究。

綜觀寇宗奭與陳士鐸的論述，「皮」、「黑」、「阿井水」在阿膠製做上扮演重要關鍵角色。那麼，製膠原料為什麼是用動物的皮而非其他部位？為何以黑皮、阿井水為佳？關於這些問題，目前研究成果或僅聚焦於單一文本的討論；⁸或僅羅列史料，缺少解釋和分析；⁹或僅以「事涉五行配色理論」一語帶過。¹⁰然而，五行理論究竟如何運用於阿膠製做的解釋？而且，仔細爬梳史料便可發現，歷代本草文本解釋相關問題時，多包含「煎膠用皮者，取其發散皮膚之外」、「皮走於肺，肺主皮毛」、「黑屬水，專入腎」以及「天一生水」等論述。¹¹顯見上述問題的背後，不只涉及五行理論，亦與天人感應論、易學等關係密切。先前研究成果大多僅觸及皮毛，並未深入探討，致使相關論述往往陷入一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況。

不僅如此，亦有其他專著從現代醫學臨床應用、全球貿易等角度，切入探討阿膠的療效、真偽以及消費市場等問題，指出偽膠自古以來便層出不窮，直至現代依然存在。¹²尚有學者透過現代科學鑑定方法，鑑別現今中藥市場上阿膠的真偽並進行品質控制。¹³不過，梳理歷代本草文本可以看出，其實真膠、偽膠的辨別標

-
- 6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卷16，〈驢肉〉，頁8；（宋）唐慎微撰，寇宗奭衍義，《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晦明軒刊本），卷18，〈獸部下品·驢屎尿乳軸垢等〉，頁8。
 - 7 (明)陳士鐸，《本草新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卷5，〈羽集·阿膠〉，頁274。
 - 8 劉世珣，〈以驢為藥——《本草綱目》中的驢藥論述〉，收入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臺北：前衛出版社，2023），頁76-79。
 - 9 燕娜娜等，〈阿膠炮製歷史沿革與現代研究進展〉，《中藥材》，2018年12期，頁2948-2951；張金聚等，〈阿膠歷史沿革考〉，《中國中藥雜誌》，2020年10期，頁2465-2468；魯春曉、劉勇，〈東阿阿膠製做技藝產業化研究——基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8-13。
 - 10 趙佳琛等，〈經典名方中阿膠的本草考證〉，《中國實驗方劑學雜誌》，2022年10期，頁318-326。
 - 11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卷16，〈驢肉〉，頁14；（明）陳士鐸，《本草新編》，卷5，〈羽集·阿膠〉，頁274；（明）李中梓，《雷公炮製藥性解》（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3），頁162。
 - 12 Natalie Köhle, "Feasting on Donkey Skin," in *Prosperity: China Story Yearbook 2017*, edited by Jane Golley and Linda Jaivi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177-182.
 - 13 趙英傑等，"Authentication of Equine DNA from Highly Processed Donkey-Hide Glue (Colla Corii

準隨時代而異；而且，相關判別論述諸如「真膠光黑如豎漆」、「偽膠氣味濁臭」以及「真膠質脆易斷」，多涉及視覺、嗅覺與觸覺等主觀感知，先前研究較少注意到此層面。¹⁴

本文嘗試將阿膠放在歷史脈絡中查考，從醫藥文化史、知識史、感官史、環境史等角度切入探究製膠原料從牛皮演變到驢皮的過程，黑驢皮、阿井水在製膠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真膠、偽膠的辨別依據。當中不僅涉及阿膠的炮製和藥物認知的轉變，以及不同文本之間阿膠記述的歧異，亦牽涉阿膠產地的環境論述以及視覺、嗅覺、觸覺等主觀感知，更反映了阿膠在本草知識傳統中的位置及其與自然宇宙論之間的聯繫。

二、發散皮膚之外與肺之合皮：從牛皮到驢皮

《神農本草經》約成書於東漢末年，是書以三品分類法，將本草分為上、中、下三品。¹⁵ 上藥「為君」，「主養命」，「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為臣」，「主養性」，「無毒、有毒」，「斟酌其宜」，「遏病補虛羸」；下藥「為佐使」，「主治病」，「多毒」，「不可久服」，「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¹⁶ 此種分類方式，為後世所承襲。《神農本草經》的內容多源自於原始的醫療記錄，匯集了諸多古代珍貴的醫療經驗。該書亦提出君臣佐使、陰陽配合、四氣五味、七情和合等藥物學理論，對後世影響深遠。三國至魏晉時期，吳普（生卒年不詳）、李當之（生卒年不詳）等人曾針對《神農本草經》進行增訂刪補，並加以傳鈔，致使社會上出現多種《神農本草經》的傳本。爾後，梁陶弘景（456-536）搜羅諸多傳世的《神農本草經》傳本，並增加魏、晉及其以前名醫記錄的資料（如：《名醫別錄》），加以重新規範、訂補，完成了《本草經集注》。¹⁷

Asini) Using SINE Element”，《藥品食物分析》，19卷第2期（2011.6），頁123-130；董璋璋等，“Quality Control of Colla Corii Asini Using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Chemometrics Clustering Techniques”，《藥品食物分析》，20卷1期（2012.3），頁154-160。

14（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卷50，〈獸之一·畜類·阿膠〉，頁2794；（明）陳嘉謨，《本草蒙筌》（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卷9，〈獸部·阿膠〉，頁374。

15《神農本草經》一書的作者，目前仍難以確定。有關《神農本草經》成書時間與過程的考證，詳見丁振國、張淨秋，〈《神農本草經》成書考〉，《中醫藥文化》，2023年5期，頁434-452。

16（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1，〈序錄〉，頁7。

17 鄭金生，《藥林外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10、12、14-15。

《本草經集注》援引《神農本草經》的記載，指出阿膠又名「傅致膠」，並將其列在「獸上品」。¹⁸ 阿膠何以又名「傅致膠」？有學者認為「致」同「制」，相傳阿膠是由傅氏僧人撿拾富貴人家所丟棄之牲皮煮濟荒民時，無意間製做而成，後世因此以「傅氏仁膠」表示上等膠品。¹⁹ 不過，「致」同「制」的說法似乎有些牽強，亦或許是在簡體字書寫系統下的思維。其實，明清醫學家盧之頤（約 1598-1664）曾對此提出解釋。其所著之《本草乘雅半偈》從藥物名稱和外部特徵等層面入手，參雜儒理、佛理，並結合個人經驗來探討藥理。是書指出阿膠「一名傅致，如言傅會致使，會之始至也」，就此句的字義上來看，「傅致」意為「附益而引致」，意即增益而引發、導致某種情況。²⁰ 其中，「傅會」可指湊合，「會之始」的「會」則可指稱時機。因此，阿膠之所以又名「傅致膠」，或許可以理解為將此藥物與其他物質一起湊合使用，治療的時機就出現了。

值得注意的是，阿膠並非一開始即以驢皮製成。《本草經集注》引用《名醫別錄》，點出阿膠係「煮牛皮作之」。而且，此藥物味甘，平，微溫，無毒，主治心腹內崩，勞極洒洒如瘧狀，腰腹痛，四肢痠疼，女子下血，安胎，久服輕身益氣。²¹ 陶弘景亦依據阿膠的厚薄和清濁，指出「清薄者，書畫用；厚而清者，名為盆覆膠，作藥用之；……濁黑者，可膠物用，不入藥也」。²² 顯示質地厚且色澤清亮透徹的阿膠，方可入藥；質地清而薄的阿膠，只能入畫，意即用作顏料油墨；質濁而黑者，則僅能作為黏合用的膠料。

然而，為什麼「厚而清者」才能「作藥用之」？《本草經集注》與其他本草書中未見相關解釋。不過，現代學者利用科學實驗，觀察發現阿膠作為藥物使用時，其成分比例達到特定濃度，治療效果最好，這或許可以作為理解阿膠「厚而清者」才能「作藥用之」的參考點之一。²³ 至於入藥的阿膠為什麼又名為「盆覆

18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6，〈蟲獸三品·上品·阿膠〉，頁400。

19 趙佳琛等，〈經典名方中阿膠的本草考證〉，頁319。

20 (明)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1986），冊85，卷3，〈本經上品·阿膠〉，頁61；〈漢典·傅致〉，<https://www.zdic.net/hans/%E5%82%85%E8%87%B4>（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21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6，〈蟲獸三品·上品·阿膠〉，頁400。

22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6，〈蟲獸三品·上品·阿膠〉，頁400。

23 有關阿膠濃度與治療成效的討論，詳見徐敏華、陳潮宗、蘇振隆、翁清松，〈中草藥結合明膠應用於敷材之研究〉，《先進工程學刊》，5期（2015.1），頁27-35。

膠」？此問題或可從北魏賈思勰（生卒年不詳）《齊民要術》中關於「煮膠法」的記載一窺端倪。《齊民要術》指出將皮以水煮到爛熟後，以匕瀝汁，微有黏勢，膠便熟矣。此時，取淨乾盆，放在正灶旁邊，以瀝米架加盆，用蓬草過濾膠汁於瀝米架上，以大杓挹取膠汁，瀉著蓬草上，濾去滓穢。膠盆向滿，扛抬至空靜處屋中，令其冷凝。清早，倒覆盆於席上，脫取凝膠。²⁴ 換言之，製做阿膠時，必須經過一個「以盆凝膠後，覆盆取膠」的過程，「盆覆膠」之名，很可能因此而來。

透過《本草經集注》的記載可知，以牛皮製成的阿膠藥性微溫，無毒，主治不規則或大量出血、虛弱勞損、腰腹與四肢疼痛以及女子便血，亦可安胎，甚至可以「輕身益氣」。前述曾提及《神農本草經》根據藥材毒性，以上、中、下三品分類藥物，其中，上品藥「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阿膠正是因為「無毒」、「輕身益氣」等特性，被列在上品藥之列。

唐顯慶二年（657），蘇敬（599-674）奏請重修本草，得到朝廷許可。他便在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的基礎上，重新修訂而成《新修本草》，新增了胡椒、茴香等藥物，以及大量的注說、藥圖與圖經。²⁵ 《新修本草》亦收錄阿膠，其相關論述幾乎完全承襲《本草經集注》而來，阿膠依然為煮牛皮製做而成，且一樣列於「獸禽·獸上」項下。²⁶

不過，唐代也開始出現以驢皮製膠的記載。陳藏器（681-757）《本草拾遺》即載：「凡膠俱能療風，止洩，補虛，驢皮膠主風為最。」²⁷ 在陳藏器筆下，驢皮膠成為治療風病的最佳良藥。所謂風病，傳統中國醫學視風為「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至其變化，乃為他病」，如風寒、風熱、風濕、風燥等。²⁸ 儘管《本草拾遺》的記載顯示到了唐代，已有用驢皮製膠的案例，且治療風病的效果最好；但就普遍性而言，宋代之前的阿膠，大多仍然係以牛皮而非驢皮熬煮而成。

24（後魏）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卷9，〈煮膠〉，頁551。

25 鄭金生，《藥林外史》，頁16-17。

26（唐）蘇敬，《新修本草》，卷15，〈獸禽·獸上·阿膠〉，頁8。

27《本草拾遺》以拾綴《新修本草》遺漏的藥物為主旨，故以「拾遺」為名。是書現已亡佚，但其內容被《醫心方》、《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本草綱目》等本草方書採錄，主要內容因而得以保存。本文此處所引《本草拾遺》，即出自於《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的載錄。詳見（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16，〈獸部上品·阿膠〉，頁14。

28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素問譯解》（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4），〈風論篇第四十二〉，頁320、324。

令人好奇的是，製膠原料為什麼是用動物的皮而非其他部位？寇宗奭《本草衍義》的記載提供了蛛絲馬跡。是書載：「煎膠用皮者，取其發散皮膚之外也。」²⁹從字面上來看，以動物皮製膠的原因在於取「將體內的熱邪散出於皮膚之外」的象徵意象。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煎膠用皮亦或許與前述阿膠主風病有關。動物皮入藥，通常取其表層；對人體來說，皮表層正是保護身體不受風邪等邪氣侵擾的第一道防線。《黃帝內經·素問》載：「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明代陳士鐸則將此理解為皮「走於肺，肺主皮毛」，顯見皮以及附著於皮膚的毫毛與肺的衛氣關係密切。³⁰一方面，肺外合於皮，與自然界息息相通，容易受到風邪的擾亂。另一方面，肺衛之氣足，則皮毛腠理固密，身體抵抗力強，不易受風邪侵襲；肺衛之氣虛，則皮毛腠理疏鬆，易受風邪侵犯。顯示調理好皮毛，使其腠理堅固、緊密，即可使人體免於風邪侵擾。

在上述脈絡下，取動物皮的表層入藥，或許可以從「以形補形」、「取象比類」等模擬和聯想的角度來理解。經驗無疑是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但模擬與聯想的思維方式亦是認識藥物功效的重要方法。³¹「以形補形」、「取象比類」的設想與原則，立基於「同化」或「感應」的身體觀。此種概念的思維邏輯，在於以屬性類似或是具關聯性的兩者相互類比，進而建立起某種聯想，近似於巫術研究中的「萬物有靈」與「相似律」。³²此種思維方式運用在藥物療效的解釋，起源甚早，在《黃帝內經》中就可見端倪；且不僅止於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唐宋時期藥物學的發展，亦有賴於這種思維方式被進一步廣泛地運用。³³以動物皮製做

29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卷16，〈驢肉〉，頁14。

30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素問譯解》，〈五藏生成篇第十〉，頁93；(明)陳士鐸，《本草新編》，卷5，〈羽集·阿膠〉，頁274。

31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49。

32 英國社會人類學、神話學和比較宗教學家弗雷澤(J. G. Frazer, 1854-1941)將交感巫術思維原則歸納為順勢巫術(相似律)和接觸巫術(接觸律)兩種。鄭金生指出，「相似律」係根據人與物之「相似」而建立的某種聯想，此種聯想和中國古代思維方式中的「援物比類」、「象形比類」、「述類象形」等有共同之處。「接觸律」則是根據事物之「接觸」而建立起來的聯想，這種聯想認為事物一旦互相接觸過，它們之間無論遠近，都將一直保留著某種聯繫。除了本文討論的阿膠之外，陳秀芬關於人藥的研究，亦為此原則在中國古代本草如何運作，提供了詳細的案列。詳見鄭金生，《藥林外史》，頁82；陳秀芬，〈從人到物：《本草綱目·人部》的人體論述與人藥製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本3分(2017.9)，頁589-641；J.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後者中文譯本可參見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汪培基等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

33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頁49-50。

而成的阿膠，正是在「同類相關」的設想下，可保護人體不受外在風邪侵襲；而且，皮「走於肺」，故也可強化人之肺氣，增強抵抗風邪侵擾的能力。

另一值得探究的問題為宋代之以前以牛皮而非驢皮製膠的原因，此現象或與古時候的中國家戶不太養驢有關。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的記載可作為佐證，是書載：「自秦已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其種大抵出於胡地。」³⁴顯示驢並非中國原產，秦代之以前，中國境內很少有驢；有學者甚至認為驢在上古中國屬於稀有珍貴的動物，僅供觀賞娛樂，不作為役畜使用。一直要到張騫（?- 西元前 114）通西域之後，驢才隨著馬、騾、駝引入中國，且一開始大多集中在關中地區，之後才逐漸擴散至晉、冀、豫、魯等地。爾後，因驢的性情溫和，耐力持久，且較馬、牛省草料，加上其繁殖適應能力強，容易養，不易得病，遂逐漸成為中國境內常見的家畜。³⁵儘管如此，「驢、馬皮薄毛多，膠少，倍費樵薪」，故在宋代以前驢皮並未廣泛用來製做阿膠。³⁶

不過，唐末五代，政府的「斷屠鈞」與「牛革筋角稅」政策，使牛皮變得稀有，進而導致尋找替代原料勢在必行。先就「斷屠鈞」政策來看，此政策是指由政府強力推行之在某一特定時段內禁止屠宰、漁獵等活動的政策。唐朝後期，「斷屠鈞」嚴格禁止殺牛，《唐會要》載：「大中二年二月制，爰念農耕，是資牛力，絕其屠宰。……委所在州府長官，并錄事參軍等，嚴加捉搦。如有牛主自殺牛，并盜竊殺者，宜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先決六十，然後准法科罪。」³⁷顯示此時已經將牛看作農耕主力，牛主不可自意屠殺牛隻。而且，不僅成牛如此，小牛亦在禁止宰殺之列。唐大中五年（851）正月，政府頒布勅令：「應屠宰牛犢，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後，三年內不得屠宰，仍切加禁斷，如郊廟饗祀，合用牛犢者，即以諸畜代之。」³⁸再就「牛革筋角稅」來說，唐末五代戰亂頻仍，政府認為牛羊筋角為製造衣甲軍器所需要，故下令皆嚴禁出境；而且，農民的牛隻死亡之後，在未經官員驗視之前，不得解剖；且其皮革筋角皆輸於官，以牛革筋角作

34（明）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卷 29，〈驢羸〉，頁 835-836。

35 鄭丕留主編，《中國馬驢品種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頁 106-107。

36（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校釋》，卷 9，〈煮膠〉，頁 550。

37（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41，〈斷屠鈞〉，頁 733-734。

38（宋）王溥，《唐會要》，卷 41，〈斷屠鈞〉，頁 734。

稅，隨兩稅輸納。³⁹ 在「斷屠鈞」與「牛革筋角稅」政策的雙重影響之下，一般百姓幾乎無法使用牛皮，致使製做阿膠的主要原料開始出現轉變。

降至宋代，唐慎微（生卒年不詳）在《嘉祐補注神農本草》與《本草圖經》的基礎上，補充大量基本資料，拓展本草學內容，進而撰成《經史證類備急本草》。⁴⁰ 是書引《嘉祐補注神農本草》記載：將驢皮「覆患瘡人良」，且如將驢皮和著毛煎做膠，可治療風毒和骨節痛，且與酒一起服用，效果更佳。⁴¹ 所引《本草圖經》亦載：「阿膠，出東平郡，煮牛皮作之，出東阿，故名阿膠。……造之，用阿井水煎烏驢皮，如常煎膠法。……尋方書所說，所以勝諸膠者，大抵以驢皮得阿井水乃佳耳。」⁴² 顯見宋代以降，以驢皮做膠日趨普遍，且以阿井水煎煮者品質最好。惟製膠原料從牛皮變為驢皮，其主治病症亦因而有所改變。意即從一開始的牛皮膠主治不規則或大量出血、虛弱勞損、腰腹與四肢疼痛、女子便血、安胎，到驢皮膠為治療風病的最佳良藥，再到治瘡、風毒以及骨節痛。而且，宋代開始強調將驢皮膠與酒一起服用，效果更好。惟不僅驢皮膠如此，驢的其他部位如：驢頭、驢脂、驢毛等入藥時，亦必須浸泡在酒中或是與酒一起使用。⁴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牛皮和驢皮製膠之外，亦有煮鹿角做膠，名為「鹿角膠」。明代著名藥物學家李時珍（1518-1593）明確點出了此三者之間的差異。他引經據典指出：阿膠一名傅致膠，煮牛皮作之，其性味皆平補，宜於虛熱；鹿角膠又名「白膠」，煮鹿角作之，效用倍於牛膠，鮮有真品，其性味熱補，非虛熱者所宜。南北朝名醫甄權（541-643）以為黃明即為鹿角白膠，後世醫者亦採黃明諸方附之。李時珍認為甄權此種說法有誤，他點明黃明膠即水膠，為牛皮所做，其色黃明，並非白膠，且亦非用阿井水煎煮而成；惟其功用與驢皮膠相仿，如驢皮膠難得，則亦可使用真牛皮膠替代。⁴⁴

39 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 218。

40 鄭金生，《藥林外史》，頁 24-27。

41（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 18，〈獸部下品·驢屎尿乳軸垢等〉，頁 7-8。

42（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 16，〈獸部上品·阿膠〉，頁 14。

43（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 18，〈獸部下品·驢屎尿乳軸垢等〉，頁 7-8。

44（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50，〈獸之一·畜類·黃明膠〉，頁 2797。

三、黑屬水專入腎：以烏驢皮製膠

宋代以降，以驢皮做膠逐漸成爲主流。然而，並非所有品種的驢皮皆適合製做阿膠。大體而言，中國所產之驢，其毛色依關中驢、德州驢、晉南驢、廣靈驢、佳米驢、泌陽驢、慶陽驢、新疆驢、華北驢、西南驢等品種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大體而言，包括：灰、烏（黑）、白、蒼、栗、青等色。⁴⁵

衆多顏色的驢之中，以烏驢之皮最常用於阿膠的製做。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援引《本草圖經》的記載指出，製做阿膠須用「阿井水煎烏驢皮」；李時珍《本草綱目》亦引述《本草圖經》，點出「以烏驢皮得阿井水煎成乃佳」；晚明藥物學家倪朱謨（生卒年不詳）《本草彙言》引《別錄》記載，認爲「煮法，必取烏驢皮」；明末清初醫學家劉若金（1585-1665）《本草述》載煎煮阿膠「必取烏驢皮刮淨去毛」；清人王如鑿（生卒年不詳）《本草約編》指出阿膠「皮以烏驢爲上」；清人閔鉞（生卒年不詳）《本草詳節》也強調製做阿膠以烏驢皮爲佳；清代著名醫家張璐（1617-?）《本經逢原》更主張煎膠所用的烏驢，不僅「其皮表裏通黑」，其舌亦黑。⁴⁶不過，究竟爲什麼一定要以烏驢皮製膠或以烏驢爲上、爲佳？

宋代藥學著作《本草衍義》的記載揭示了謎底。是書明確指出煎膠必用烏驢皮的原因在於「取其水色，蓋以制其熱則生風之義」。⁴⁷這種說法除了收錄於《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之外，亦被後來的《本草品彙精要》、《本草蒙筌》等明代本草書載入。明代醫學家李中梓（1588-1655）《雷公炮製藥性解》更將此種

45 關中驢主要分布在關中和延安地區；德州驢以魯北平原和沿渤海各縣爲中心產區；晉南驢分布於山西省南部地區；廣靈驢產於山西省東北部的廣靈、靈邱兩縣；佳米驢的中心產區位在陝西省佳縣、米脂、綏德三縣；泌陽驢產於河南省泌陽縣；慶陽驢主要產區爲甘肅省慶陽地區；新疆驢產於新疆南部塔里木周圍的綠洲地區，包括喀什、和田以及阿克蘇等地；華北驢產於黃河中下游、淮河以及海河流域，遍布華北各省與內蒙古南部以及東北三省的農業區和半農半牧區；西南驢主要產地爲雲南西部、四川西北以及西藏地區。詳見鄭丕留主編，《中國馬驢品種志》，頁110-130。

46（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16，〈獸部上品·阿膠〉，頁14；（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50，〈獸之一·畜類·阿膠〉，頁2793；（明）倪朱謨，《本草彙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卷18，〈獸部·畜類·阿膠〉，頁1071；（清）劉若金，《本草述》（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十五年選讀山房刊光緒二年姑蘇來青閣印本），卷31，〈獸部·阿膠〉，頁29；（清）王如鑿，《本草約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稿本），卷14，〈獸部·畜類·阿膠〉，頁18；（清）閔鉞，《本草詳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康熙二十年獸堂主人刻本），卷10，〈獸部·阿膠〉，頁20；（清）張璐，《本經逢原》（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卷4，〈獸部·豬等·阿膠〉，頁248。

47（宋）寇宗奭，《本草衍義》，卷16，〈驢肉〉，頁8。

說法與自然界中常見的物質元素以及人體五臟聯繫在一起，指出：「阿膠用黑驢皮造成，黑屬水，專入腎，能克火，蓋以制熱則生風之義，故宜入肝。」⁴⁸ 惟不僅驢皮，驢其他部位入藥亦「以烏驢尤佳」、「黑者最良」。⁴⁹

那麼，「取其水色，蓋以制其熱則生風之義」到底所指為何？此句中有幾個關鍵詞彙——「烏（黑）」、「水」以及「制熱則生風」，而「五行」與「五色」正為理解這些關鍵詞彙的重要概念。古人用「五行」來解釋萬物世界以及宇宙天體永無休止，運行不息的道理。「五行」由「木、火、土、金、水」五種常見的物質元素或形態組成，分別對應地理上「東、南、中、西、北」五個方位、自然界中「青、赤、黃、白、黑（烏）」五種顏色與「春、夏、長夏、秋、冬」五季，以及人體「肝、心、脾、肺、腎」五臟與「酸、苦、甘、辛、鹹」五味，可謂概括人體以及整個自然和宇宙知識於其中。⁵⁰ 而且，「五行」之中，存在著相生相剋的規律，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與聯繫。⁵¹ 當中，五色中的「黑」，對應至五行中的「水」，而水能剋火，正可「制熱則生風」。意即水可以抑制因外感熱邪太甚，傷及營血，燒灼肝經，致使肝風內動，體內產生高熱所導致的生風病變，諸如：兩目上視、躁擾不安、神志不清、胡言亂語、肢體抽搐等症狀，是以製做阿膠用黑驢皮為佳。

值得注意的是，爬梳古代醫籍文獻便可發現，自宋代以降，始強調製做阿膠要用「黑」驢皮，且以五行理論加以解釋。那麼，為什麼是宋代才開始出現這種現象？此與陰陽、五行學說在醫學上之思辨的發展歷史頗有關係。西漢董仲舒（西元前 179 年 - 前 104 年）融和陰陽、五行之說；到了東漢，出現了融和《周易》、

48 (明) 李中梓，《雷公炮製藥性解》，頁 162。

49 (宋) 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 18，〈獸部下品·驢屎尿乳軸垢等〉，頁 7；(明) 盧和，《食物本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隆慶四年一樂堂重刊本)，卷 3，〈獸類上·驢肉〉，頁 26；(明)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50，〈獸之一·畜類·驢〉，頁 2779。

50 「五行」之中，生發柔和為木象，象徵宇宙萬物生命，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陽熱上炎為火象，代表生發力量，光輝且有熱力；長養變化為土象，象徵地球，是人類萬物立足的根本之處；清肅堅韌為金象，象徵著堅固；寒潤下行為水象，代表凍結含藏的性能。詳見南懷瑾，《禪與道概論》(臺北：真善美出版社，1968)，頁 182-183；武晉、王永生編著，《周易百題問答——周易與中醫氣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 162-164；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59-61.

51 相生指的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剋則是指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五種元素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與聯繫。詳見武晉、王永生編著，《周易百題問答——周易與中醫氣功》，頁 162-164；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59.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陰陽、五行之說爲一體，並輔以數術推演來解釋天地生成、政治人倫、萬物化生的學術風氣和思維方式。爾後，宋明理學的興起，更被看作是這種變化的重演。不過，漢到宋之間，上述理論體系和思維方式在醫學上的應用，仍然有明顯區別：漢代既強調陰陽之間的循環，亦注重陰陽的對立和平衡；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時期卻風尚大變，獨重實用；到了宋代，學術風尚有所變化，醫家對於理論的興趣也隨之轉濃，影響所及，漢代醫學經典中的陰陽、五行之說倍受青睞，愈發成爲醫學闡釋的重要理論基礎。⁵²

就上述陰陽、五行學說在醫學上之思辨的發展歷史來看，梁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或許即是受到當時學術風尚的影響，講究實用，故著重阿膠之藥性與主治病症的描述，並未特別強調「黑」驢皮，亦未從五行理論來解釋阿膠的功效。相較之下，宋代本草文本，諸如《本草圖經》、《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以及《本草衍義》，受到當時醫家對理論有濃厚興趣的影響，將漢代醫學經典中的五行學說作爲解釋阿膠功效的理論基礎，特別強調「黑」驢皮爲重要的製膠元素，並透過五色和五行的對應關係，以及五行之中的相剋規律解釋煎膠必用黑驢皮的原因。由此可知，關於阿膠藥性與功效的描述，並非一開始即用陰陽五行學說來解釋，而是有其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先有關於阿膠的研究討論，似乎並未注意到這一點。

「五行」原是古人用來闡述、解釋宇宙自然萬物和現象的重要學說，宋代以降的本草書隱諱地以此來闡釋阿膠以黑驢尤佳的原因，無形中將阿膠製做與自然宇宙論聯繫在一起，深化了阿膠論述的內涵。

然而，儘管宋代以降的本草書不斷強調製做阿膠時，以黑驢爲佳，但明末清初醫學家陳士鐸卻對此種說法不以爲然。陳士鐸在《本草新編》一書中特別「糾正」了前人的觀點，他指出以前的人之所以尚黑驢，背後有一重要原因——「取黑以走腎」；然而，他認爲水原本即入腎，故不須特別取黑者，前人所謂「屬水以制其熱則生風之義」，反而畫蛇添足，多此一舉。⁵³ 清人汪紱（1692-1759）在《醫林纂要探源》中也提出質疑：「牛馬之皮亦皆可膠，膠則滋補，何必黑驢？」⁵⁴ 兩者皆認爲製膠原料不一定非用黑驢皮不可。

52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頁 101-102。

53（明）陳士鐸，《本草新編》，卷 5，〈羽集·阿膠〉，頁 274。

54（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卷 3，〈毛部·阿膠〉，頁 235。

進一步而論，無論「黑走腎」或是「水入腎」，實與前面所提到的「五行」學說關係密切。誠如前述，「五行」與五色、五臟之間，有一對應關係，在此對應框架下，五行之中的水，對應至五臟的腎以及五色之中的黑色，是以「黑走腎」，「水入腎」。其他則為木對應肝和青色，青走肝，木入肝；火對應心和紅色，紅走心，火入心；土對應脾和黃色，黃走脾，土入脾；金對應肺和白色，白走肺，金入肺。上述元素彼此之間相互資補，相互克制。如果和諧相處，則萬物均平，肌體健壯；如果失和，則物物相殘，臟器相傷。⁵⁵

綜觀來看，天人相感應論構成了中國傳統醫學思想框架中的基本原理，亦為重要的組成成分。⁵⁶ 對古人來說，製做阿膠時，不僅需要顧及人體小宇宙自身的平衡，亦必須考慮人體小宇宙與自然大宇宙之間的對應與穩定關係。無論「屬水以制其熱則生風之義」，或是「取黑以走腎」、「水入腎」的論述，皆為運用「天人合一」之構想，將古人用以闡釋宇宙萬物現象的學說，套用於阿膠的解釋上，將阿膠認知與宇宙論聯繫在一起。

四、從「趨下清而重」到「天一生水」：阿膠的道地問題

自《本草經集注》以降，藥物產地的描述便成為本草文本中相當重要的內容。然而，早期本草文本關於產地的記載，卻出奇地簡略。⁵⁷ 綜觀這些文本有關阿膠產地的討論，都有「因出於『東阿』地方，故曰阿膠」、「出／生東平郡」的類似論述。如《本草經集注》即記載「出東阿，故曰阿膠」；《本草圖經》亦載阿膠「出東平郡」，「出東阿」；《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則載「生東平郡」，「出東阿」。⁵⁸

55 朱伯崑，《易學漫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 185-186；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59.

56 (日)山田慶兒，《物類相感志》的產生及其思考方法》，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 126。

57 鄭金生，《藥林外史》，頁 40、44。

58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6，〈蟲獸三品·上品·阿膠〉，頁 400；(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 16，〈獸部上品·阿膠〉，頁 14。「東阿」在不同時期指稱不同的地區，綜觀而言，中國近世本草書中的「東阿」指稱兩處：一為今山東省聊城市陽谷縣阿城鎮西北三公里處，即古阿井附近區域，唐天寶年間（742-756）改隸鄆州東平郡；另一為山東省濟南市平陰縣東阿鎮，明洪武年間（1368-1398）隸屬兗州管轄。古阿井逐漸淤塞、交通條件改變、製膠技術的傳播等因素，致使阿膠產地在明洪武年間由古阿井附近地區，遷至濟南的東阿鎮。降至明末清初，東阿鎮已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阿膠製做地和集散交易中心。由於此兩地相距不遠，且皆為濟水流經，自然環境相差不大，故近世以降皆以「東阿」稱

不過，並非只有東平郡、東阿才出產阿膠。河南、江蘇、浙江等地也是阿膠產地。而且，《大明會典》以及明朝文獻學家、藏書家王圻（1530-1615）、王思義（生卒年不詳）父子撰寫的百科式類書——《三才圖會》皆記載東北建州女真朝貢給明朝的貢物中，即包括阿膠；明人張萱（約1553-1636）《西園聞見錄》亦載黑龍江產阿膠；清人諸仁安（生卒年不詳）《營口雜記》也有「鹿角膠、虎骨膠、阿膠營口所賣，皆自瀋陽來」的記述。⁵⁹《朝鮮王朝實錄》亦有諸多忠清道、慶尙道、全羅道、黃海道、江原道等地以阿膠作為貢賦的記載。⁶⁰從這些記錄來看，除了河南、江蘇、浙江之外，中國東北以及東北亞地區，亦為阿膠產地。

既然如此，為什麼本草文本多描述阿膠出於東阿地方或是東平郡？其實，這類論述背後，往往涉及藥材「道地」的問題。道地藥材的概念可追溯至孫思邈（581-682）《備急千金方》中的「（古之醫）用藥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⁶¹意即古時醫者用藥，相當講究產地，因此給十個人看病，能治癒其中的九個人。到了明代，官修本草書——《本草品彙精要》多次使用「道地」兩字描述藥物，如該書描述五味子時，即特別標出「道地」一項：「【道地】高麗建平者佳。」⁶²意即在當時，以建平（今遼寧省建平縣）所產的五味子為佳。包含五味子在內，《本草品彙精要》一共記載了一千八百多種藥物，其中兩百六十多種藥物的說明使用了「道地」兩字，顯示「道地」與藥物的聯結此時已相當流行，這或許與明代跨區域的藥物貿易不無關係。⁶³

之。相關討論詳見魯春曉、劉勇，《東阿阿膠製做技藝產業化研究——基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頁29-30、32-33。

59（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文職衙門·禮部·主客清吏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卷107，〈朝貢三·東北夷·海西建州〉，頁1606；（明）王圻，《三才圖會·地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卷13，〈東北夷·女直諸國〉，頁35b；（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外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169，卷55，〈兵部四·邊防後下·女直·前言·附建州三則〉，頁18；（清）諸仁安，《營口雜記》，收入（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光緒三年至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頁3。

60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地理志》（首爾：東國文化社，1956），卷149，〈忠清道〉，頁2；同書，卷150，〈慶尙道〉，頁2；同書，卷151，〈全羅道〉，頁2；同書，卷152，〈黃海道〉，頁1；同書，卷153，〈江原道〉，頁2。

61（唐）孫思邈，《備急千金方》（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卷1，〈序例·用藥第六〉，頁9。

62（明）劉文泰等撰，《本草品彙精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卷9，〈草部·上品之下·五味子〉，頁280。

63 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33-135.

由此觀之，「道地」原指涉藥材的產地，現今則以「道地藥材」指稱來自特定產區、技術精細、歷史悠久，且品質和療效更佳、更穩定的藥材，亦因此成爲優質藥材的代名詞。⁶⁴將《本草經集注》、《本草圖經》、《經史證類備急本草》關於阿膠的記載放於前述脈絡下來看，出於東平郡東阿縣的阿膠，才是道地的阿膠。

然而，爲什麼出於東阿地方的阿膠才是道地的阿膠？關於這個問題，《本草經集注》並未解釋。《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則援引北宋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的記載加以說明：「【沈存中筆談】東阿是濟水所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服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惟相關論述並不列在「獸部上品·阿膠」項下，而是位於「玉石部下品·銅錫瓦鹽水土灰等附·泉水」之中。⁶⁵

沈括對於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歷史、考古等皆有深入的研究，可謂一位淵博之士。其晚年以筆記文學體裁寫下的《夢溪筆談》，即包含了其多年累積的見聞和見解，可說是一部議題廣袤的小型百科全書。⁶⁶《夢溪筆談》針對阿膠道地問題所提出的解釋原句如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⁶⁷由此觀之，沈括認爲出於東阿縣的阿膠才是道地藥材的關鍵，在於東阿地方爲濟水所經，而濟水的特性「趨下」，且「清而重」，適合用來治療淤濁、逆上之病症，可以疏痰、止吐。沈括這種取濟水「去濁」和「趨下」之意來醫治汙濁、逆上之痰的論述方式，可說是將宇宙自然界中的現象，轉化爲象徵意象，並取此種意象來闡釋阿膠的製做。

有趣的是，將《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與《夢溪筆談》的論述相互比對之後，可以發現沈括還特別強調上述意含並不載於當時的醫方，但具體原因爲何？目前不得而知。不過，當時的本草知識分類，或許是一個參考點。透過《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可知，是書分析阿井的性質與療效時，並非將其放在獸部藥「阿膠」項

64 關於「道地」藥材的討論，參見：黃璐琦等著，《道地藥材理論與文獻研究》（臺北：文光圖書，2017）。

65 （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5，〈玉石部下品·銅錫瓦鹽水土灰等附·泉水〉，頁23。

66 賴錫三，〈《夢溪筆談》〈象數〉門中的「象數」與「環中」——論沈括的命理觀與象數觀〉，《政大中文學報》，10期（2008.12），頁124。

67 （宋）沈括，《夢溪筆談校證·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辯證〉，頁146。

下一起討論，而是歸類於玉石類藥物中的泉水，另行描述。宋代此種本草知識的分類，使本草方書在論述阿膠時，並未一同分析阿井水的特性。影響所及，時人爬梳阿膠相關記載時，未注意到在另一分類項下才有阿井水特性的記載而忽略、漏看，亦不無可能。

沈括的觀點亦為明代醫家所繼承，祁門醫士陳嘉謨（生卒年不詳）《本草蒙筌》指出：「東阿井水，乃係濟水所注。性急下趨，清而且重。用之煎煮，攪濁澄清。服之者，能去濁汙，以及逆上痰也。」⁶⁸ 李中梓《雷公炮製藥性解》記載：「東阿井系濟水所生，性急下趨，清而且重，用之煎煮，攪濁澄清，所以能清上炎之火及上逆之痰也。」⁶⁹ 李時珍《本草綱目》更是明確點出阿井位在明代山東兗州府陽谷縣東北六十里處，即古代的東阿縣，亦為酈道元（?-527）《水經注》所指稱之「東阿有井大如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而且，《本草綱目》也載：「其井乃濟水所注，取井水煮膠，用攪濁水則清。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蓋濟水清而重，其性趨下，故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也。」⁷⁰ 值得注意的是，將《本草綱目》此段記載與前述《夢溪筆談》相互比對，便可發現兩者文字敘述幾乎大同小異。

醫學文本論述的層層套疊，本不稀奇。⁷¹ 惟按《本草綱目》體例，凡摘引他人的觀點，李時珍於書中皆有所註明，如標註「弘景曰」、「別錄曰」等；至於自己的看法，則述明「時珍曰」。然而，在阿井水的論述中，李時珍並未註明此來自於沈括《夢溪筆談》，而是直接放於「時珍曰」項下，表明此論述係屬自己的創見。李時珍此舉無疑是一種作者身分的聲稱，宣稱自己是「其井乃濟水所注，……蓋濟水清而重，其性趨下，故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也」論述的原創者。其實，此種風氣在李時珍所處的明代相當盛行，不僅個人如此，出版業亦割裂文本，雜湊成書，甚至將不同的書籍混成新編，掩去原書的樣貌。⁷² 我們或許也可以將李時珍

68 (明) 陳嘉謨，《本草蒙筌》，卷 9，〈獸部·阿膠〉，頁 375。

69 (明) 李中梓，《雷公炮製藥性解》，頁 162。

70 (明)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50，〈獸之一·畜類·阿膠〉，頁 2793。

71 關於醫學文本層層套疊與醫藥知識衍異的討論，詳見祝平一，〈醫藥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8 期（2010.6），頁 16-23。

72 相關討論詳見祝平一，〈作者、編者、剽竊者：從《晰微補化全書》看醫書的抄輯與作者身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 本 3 分（2021.9），頁 561-602。

這類舉動視為一種文本的挪用或複寫，他透過「時珍曰」這個詞彙，製造閱讀效果，形塑自己是論述原創者的形象，藉此收得立言之效，進而獲取聲望，尤其其論點不斷為後人所引述，不管是在當時或是對於後世，皆具有深遠的影響。

除了繼承、複寫沈括的觀點之外，明清時期尚有醫者從藥效、宇宙運行規律、自然界現象等角度切入，析論阿膠的道地問題。《本草品彙精要》從藥效上來陳述阿井水的必要性，強調濟水流經之阿井水在阿膠藥效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今之市者，形色製做頗精，入藥未聞其效，蓋不得此井水故耳。大抵驢皮得阿井水煎者乃佳也，其餘但可膠物，不堪藥用。」⁷³ 顯示用阿井水煎製的阿膠，其藥效較佳，惟其原因為何，是書並未多做論述。

陳士鐸強調「阿膠之妙，全在濟水」，認為之所以取阿井水，原因有二：一為阿井水由濟水所注入，濟水性急而下，趨清而且重，故取其「去濁」和「趨下」之意治逆上之痰。⁷⁴ 此種論述手法與李時珍《本草綱目》相同，皆可謂完全複寫自沈括《夢溪筆談》的論點。

不過，陳士鐸對於阿膠取阿井水，尚有另一種原因解釋，即「阿井生東方，取其天一生水」。⁷⁵ 陳士鐸此種解釋，乍看之下，與五行理論中「水」對應「北」的次序不相符合；但若分別從「生東方」與「天一生水」兩種概念來理解，或可見其深意。先就「生東方」來看，在《周易》及其卦象中，「東方」為震、為春、為木，即所謂「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象徵萬物之始。⁷⁶ 再就「天一生水」來說，此詞彙源出鄭玄（127-200）對《禮記》作注時所涉及之《周易》的解釋：

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⁷⁷

73 (明) 劉文泰等撰，《本草品彙精要》，卷 23，〈獸部·上品·阿膠〉，頁 602-603。

74 (明) 陳士鐸，《本草新編》，卷 5，〈羽集·阿膠〉，頁 274。

75 (明) 陳士鐸，《本草新編》，卷 5，〈羽集·阿膠〉，頁 274。

76 (清)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周易兼義》（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卷 9，〈說卦〉，頁 184。

77 (漢) 鄭元注，(唐) 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 14，〈月令第六〉，頁 283。

此敘述蘊含萬物生存皆有其數之意，萬物有生數，當生之時方能生；萬物有成數，能成之時方能成。而當中的「天一生水」，正是宇宙天地形成的開始，萬物皆生於此，經過不斷的創生，終繁衍成萬物。⁷⁸ 陳士鐸「生東方」和「天一生水」的阿井解釋模式，將《周易》的觀念與內涵納入其中，視阿井水為宇宙天地萬物形成之始的象徵，以此水製做阿膠，可強化該藥物「始生」的象徵意義，此種論述無疑是將宇宙運行的規律，運用在阿膠製做的解釋上。⁷⁹

清代醫學家黃宮綉（1720-1817）深研藥理，著有《本草求真》一書。是書記載：「阿膠得阿井純陰之水。」⁸⁰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阿井水為什麼是純陰之水？清代另一位著名醫者陳修園（1766-1823）曾經詳細考察阿井水與阿膠之間的關係，其論述不失為一參考點，他指出：

東阿井在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六十里，即古之東阿縣也。此清濟之水，伏行地中，歷千里而發於此井，其水較其旁諸水，重十之一二不等。人之血脈，宜伏而不宜見，宜沉而不宜浮。以之製膠，正與血脈相宜也。⁸¹

由此觀之，阿井水的來源——濟水，流於地面之下，較附近其他水源「重十之一二不等」。濟水此種特性，正好與人的血脈「宜伏不宜見」、「宜沉不宜浮」的性質相配合，是以用阿井水煎煮製成的阿膠，適合用作血脈之藥。而濟水流於地面之下的特徵，正是它被認為是純陰之水的關鍵所在，其背後與陰陽概念不無關係。

所謂陰陽，時常隱含在天人關係的論述之中，為天地萬物與人事物理之間循環、相互對立、消長的法則，意即透過陰陽互變的定律，來說明萬物變化的原理原則。早期的陰陽概念專指陰、陽兩氣，後來演變成一組抽象的觀念，由最初力倡陰陽交替、輪轉的循環，發展成為陰陽之間的相互對立、消長與平衡，可活用於任何事物和概念上。在宇宙現象中，陰代表地，陽代表天；在天體運行上，陰

78 南懷瑾，《易經雜說》（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 83-88。

79 惟陳士鐸並非首位將《周易》與中國傳統醫學結合之醫者。明代醫學家張介賓（1563-1640）也曾云：「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若能兼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一語道破醫與《周易》之間的關係。詳見（明）張介賓，《類經附翼》（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會稽張氏原刊本），卷 1，〈醫易〉，頁 21a。

80（清）黃宮綉，《本草求真》（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頁 27。

81（清）陳修園，《神農本草經讀·上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檳榔書屋刻本），卷 2，〈阿膠〉，頁 27。

代表月，陽代表日；在人體觀念中，陰代表女，陽代表男。⁸² 既然陰代表地，而濟水「伏行地中」，古人因此視阿井水為純陰、至陰之水。黃宮綉與陳修園的論點，進一步補充了自宋代以降「濟水性趨下清而重」之論述的解釋，亦可謂再次將宇宙自然界中的現象，轉化為象徵意象，並取此種意象來闡釋阿膠的製做。

透過上述可知，濟水、阿井是製做阿膠的關鍵之一，但仍有部分古代醫者以為如此還不夠，在取阿井水煎製阿膠之前，必須先將製膠之皮浸泡在狼溪水之中。那麼，為什麼是浸泡在狼溪水而不是其他水源之中呢？清代著名醫家張志聰（1588-1655）《本草崇原》以五運六氣學說注釋《神農本草經》，是書載：「聞古法先取狼溪水浸皮，後取阿井水煎膠。狼溪發源於洪範泉，其性陽，阿井水性陰，取其陰陽相配之意。」⁸³ 狼溪發源於濟南平陰縣洪範泉東側大寨山上的狼泉，由洪範泉、書院泉、白雁泉、車流泉、日月泉……等九泉之水匯集而成，橫穿古東阿縣城。狼溪「性陽」，而阿井水為「純陰之水」，此處張志聰藉由狼溪「性陽」之物性，取「陰陽相配之意」，來解釋何以在取阿井水煎製阿膠之前，必須先將製膠之皮浸泡在狼溪水之中，再次運用陰陽互變的定律，來解釋阿膠的製做。

儘管不同時期的醫者，從不同角度析論以阿井水製做而成的阿膠才是道地的阿膠，但宋代以降，也有一些醫者主張阿膠不一定要來自東阿縣，亦毋須要以阿井水煎煮。宋代醫家陳自明（1190-1270）所著之中國第一部完善的婦科專著——《婦人大全良方》中〈辨識修製藥物法度〉即記載「阿膠不必須東平，自為之甚佳」；且「東平皆京師偽膠」，「其惡為甚」。⁸⁴ 東平郡為唐、宋時期東阿縣阿井所在，由這些史料記載可知，陳自明認為東平偽膠甚多，品質不佳，故主張阿膠「不必須東平」。清人汪紱《醫林纂要探源》也指出：「愚謂濟寧東平濟南之境，凡地下得泉，皆沛水所伏，何獨東阿？」⁸⁵ 意味著整個濟南之境，都為同一水源，東阿與濟南其他地方一樣，並未特別獨特。

82 類似敘述尚包括：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晝為陽，夜為陰，乃至水火、風雨、雌雄等等。此種觀念自先秦、兩漢以降，在醫學理論中逐漸成為主流論述。相關討論詳見南懷瑾，《禪與道概論》，頁180-181；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頁87-90；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55-56.

83 (清)張志聰，《本草崇原》，收入鄭林主編，《張志聰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卷上，〈本經上品·阿膠〉，頁1124。

84 (宋)陳自明，《新編婦人大全良方》（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日本傳鈔朝鮮活字本），〈辨識修製藥物法度〉，頁7。

85 (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卷3，〈毛部·阿膠〉，頁235。

到了晚清，阿井水日漸乾涸，漸漸變得又苦又鹹，有時甚至無水可取，為製做阿膠尋找新水源已變得勢在必行。那麼，哪一條溪水較適合作為煎煮阿膠的新水源，且須具備何種特性和條件？前面所述及的狼溪，因水源豐富，無乾涸之憂，且水質偏重，加上用此溪水煮膠的效果與阿井水相同，致使取狼溪水製膠者日多，取阿井水者日少；降至清末，狼溪已成為煮膠的主要水源。⁸⁶

五、莫可甄別：真膠與偽膠

藥物藥材真偽、好壞難辨之現象，自古有之。陶弘景曾指出：「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煮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耆蜜蒸為甜，當歸酒灑取潤，蝮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顯見為了讓藥材品相更佳，商家往往採取各種「加工」手段，蒙蔽世人，無怪乎陶弘景會發出「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末如之何」的感嘆！⁸⁷ 爾後的《新修本草》、《本草蒙筌》、《本草綱目》等本草文本，也都記載了不少藥材作偽的方法；走方醫更是出現以假藥配成藥方來欺騙病家的現象。⁸⁸

真阿膠由於各種原因，難以取得，故偽膠層出不窮。在此情況下，阿膠的鑑別顯得格外重要。然而，真膠、偽膠的辨別標準隨時代而有所不同，有必要加以釐清。宋代中國因國內商業發達，對外貿易頻繁，藥業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假藥現象亦隨之更勝於先前任何一個時期。⁸⁹ 影響所及，關於辨別藥物真偽的論述不勝枚舉，阿膠即為當時常見的討論對象之一。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引《本草圖經》記載：「以阿縣城北井水作者為真，造之用阿井水煎烏驢皮，如常煎膠法。其井官禁，真膠極難得，都下貨者甚多恐非

86 關於阿膠新水源的討論，詳見魯春曉、劉勇，《東阿阿膠製做技藝產業化研究——基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頁 38-39。

87 (宋)唐慎微撰，寇宗奭行義，《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 1，〈衍義序例·梁陶隱居序·合藥分劑料理法則〉，頁 20。

88 《串雅補》稱方術有四：一頂二串三抵四色。其中，「抵」即指「偏藥抵金以欺人」，也就是用假藥配成藥方來欺騙病人。例如：以通血香假裝成孩兒口中血、山羊血。詳見(清)魯照，《串雅補》，收入《中華醫書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冊 9，〈自序〉；(清)魯照，《串雅補》，卷 3，〈抵方〉。

89 唐廷猷，《中國藥業史》(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1)，頁 271。

真。」⁹⁰是書認為真、假阿膠的辨別關鍵在於是否用阿井水煎造，以此井水煎煮者為真，反之為假。由於阿膠在古代作為貢膠，官方因而下令一般人禁止使用阿井，導致用阿井水煎煮而成的阿膠數量少之又少，是以真阿膠稀缺。

《婦人大全良方》亦載：「東平皆京師偽膠，雜以馬皮，並故鞍韉鞋底之類，其惡為甚。」⁹¹是書認為東平偽膠甚多，多以馬皮、鞋履、馬鞍等雜皮製做而成，品質低劣。顯示在陳自明筆下，真、假阿膠的辨別關鍵在於製膠原料，以牛皮、驢皮製成者為真膠，以雜皮製成者為偽膠。《寶慶本草折衷》指出：「此膠當用阿井水與烏驢皮煎成。……今之貨者，不知果驢皮、果阿水所煎耶？習用既久，莫可甄別矣。」⁹²主張辨別真、假阿膠的關鍵有二，一為阿井水，另一為烏驢皮。用阿井水與烏驢皮煎製成膠者為真，反之為假。

上述幾部宋代本草與方書以阿井水和製膠原料作為辨別真膠、偽膠的判準，惟單就製膠原料來看，判斷原則並不完全一致。有人認為無論牛皮或驢皮製成者，皆為真膠，但也有人以為必須要用烏驢皮煎製而成者，方為真膠。

到了明清時期，假藥現象更加盛行，防治假藥氾濫的措施數不勝數；⁹³與此同時，阿膠甄別的標準也出現了變化，且論述更為細緻化。《本草蒙筌》記載：「諸膠多係牛皮熬成，惟此（阿膠）用驢皮耳。……設官監禁，最難得真。凡覓拯痾，不可不試。真者質脆易斷，明澈如冰；假者質軟難敲，枯黯似墨。」⁹⁴由此來看，《本草蒙筌》認為真膠和偽膠的判準，在於品質上的差異。真膠色澤明亮透徹，且質地脆弱易斷；偽膠色澤灰暗似墨色，且質地偏軟，難以敲擊。

《本草綱目》載：「大抵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後世乃貴驢皮。若偽者皆雜以馬皮、舊革、鞍、靴之類，其氣濁臭，不堪入藥。當以黃透如琥珀色，或光黑如鑿漆者為真。真者不作皮臭，夏月亦不濕軟。」⁹⁵《本草綱目》承襲前人論述，亦從製膠原料與品質差異來辨別阿膠的真偽。雜以馬皮、舊革、鞍、靴等製成的阿膠

90（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16，〈獸部上品·阿膠〉，頁14。

91（宋）陳自明，《新編婦人大全良方》，〈辨識修製藥物法度〉，頁7。

92（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頁115。

93 關於假藥防治措施的討論，詳見唐廷猷，《中國藥業史》，頁272-275。

94（明）陳嘉謨，《本草蒙筌》，卷9，〈獸部·阿膠〉，頁374。

95（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50，〈獸之一·畜類·阿膠〉，頁2794。

爲偽膠，氣味濁臭，無法入藥。色澤「黃透如琥珀色」或是「光黑如鑿漆」者，爲真膠。所謂「黃透如琥珀色」，很可能指的是本文「發散皮膚之外與肺之合皮：從牛皮到驢皮」一節所提到的黃明膠，由牛皮製成；「光黑如鑿漆」則是指烏驢皮膠。顯見李時珍認爲無論是牛皮膠或是驢皮膠皆爲真阿膠，且真膠無臭味，夏季也不會濕軟。

《本草新編》從產地來論真膠、偽膠，是書指出：「阿膠出於東阿者即真，不必問其真假。……若加藥味雜之，更失其義矣。本欲加藥味以取益，誰知反因藥味而失利乎。」⁹⁶ 只要是東阿出產者，皆爲真品。而且，如果摻雜其他成分，則會失去阿膠原有的益處。推測《本草新編》之所以認爲「阿膠出於東阿者即真」，或許與前述本草方書相同，皆視阿井水爲辨別真膠和偽膠的關鍵。

《本草崇原》對真膠、偽膠有相當詳盡的論述：

琢崖曰：余嘗逢東阿煎膠者，細加詢訪，聞其地所貨阿膠，不但用牛、馬諸畜雜皮，并取舊箱匣上壞皮及鞍轡靴屐，一切爛損舊皮，皆充膠料。人間尚黑，則入馬料、豆汁以增其色，人嫌穢氣，則加樟腦等香以亂其氣，然美惡猶易辨也。今則作偽者，日益加巧，雖用舊皮浸洗日久，臭穢全去，然後煎煮，并不入豆汁及諸般香味，儼與真者亂矣。按膠色有黃有黑，緣冬月所煎者，汁不妨嫩，入春後嫩者，難於堅實，煎汁必老。嫩者色黃，老者色黑。昔人謂光如鑿漆，色帶油綠者爲真，猶未悉其全也。又謂：真者拍之即碎，夫拍之即碎，惟極陳者爲然，新膠安得如此。至謂真者，絕無臭氣，夏月亦不甚濕軟，則今之偽者，未嘗不然，不可以是定美惡也。然真膠非甚難得，特以偽者雜陳并得真者而亦疑之。⁹⁷

《本草崇原》的記載揭示了幾個甄別真膠與偽膠的重要訊息。首先，是書點出了古代與清代偽膠的差異。古時候的偽膠是用爛損舊皮充作膠料，並加入馬料、豆汁來增加其黑色色澤；同時，亦加上樟腦等調整阿膠的氣味。只是，無論如何調整，人們仍然容易辨別其優劣。到了清代，偽膠製做技術日益精巧，假膠不僅無臭味，也不添加豆汁及諸般香味，就如同真的一般，莫可甄別。

96 (明) 陳士鐸，《本草新編》，卷5，〈羽集·阿膠〉，頁274。

97 (清) 張志聰，《本草崇原》，卷上，〈本經上品·阿膠〉，頁98-99。

其次，《本草崇原》針對明代以降辨析真、假阿膠的判準提出了三點質疑。第一，明代以降多認為「光如豎漆」、「色帶油綠」的阿膠為真。《本草崇原》則主張阿膠嫩者色黃，老者色黑，此係煎膠月份不同所導致，無法據此辨別阿膠的真偽。第二，明代以後亦主張真膠「拍之即碎」。《本草崇原》則認為阿膠之所以「拍之即碎」，是因為此膠存放時間已久，新膠就不太會有這種狀況，此與阿膠之真假無涉。第三，明代以來多以為真膠無臭氣，且夏月亦不太濕軟。《本草崇原》則主張清代偽膠因製做技術巧妙，也可以做到無臭氣且不溼軟，故無法以此作為辨別真偽阿膠的依據。

再次，《本草崇原》也指出真膠並不是非常難獲得，人們之所以時常存疑，是因為偽膠時常摻雜真膠，讓人有所疑義。儘管如此，時人普遍大多還是認為真膠難以獲得，因而提出以其他膠替代的方案。例如清代藥物學家趙學敏（1719-1805）《本草綱目拾遺》專為收錄《本草綱目》所未載之藥物而作，並對《本草綱目》已收入的藥物進行補訂。是書即指出「阿膠真者難得，有浙膠，則較勝於用雜膠」，其理由在於浙人所製造的黑驢皮膠，其製做方法一如東阿阿膠，與東阿所造無二入，且頗具療效。⁹⁸再如清末醫家方仁淵（生卒年不詳）《倚雲軒醫案醫話醫論》也記載「泉膠」為惠山泉水所煎，肺虛者可以泉膠補之，與其服用假阿膠，不如服用真泉膠。⁹⁹在真膠難尋的情況下，以浙膠、泉膠作為替代品，亦不失為一種辦法。

綜觀歷史上對真假阿膠的辨識，相關論述的背後，不僅涉及人們的觀察、省視與認知，亦牽涉感官感知。宋代本草與方書以阿井水和製膠原料作為辨別真膠、偽膠的判準；明清時期則更為重視兩者在品質上的差異，並對前人觀點提出異議，且論述更為細緻；惟清代偽膠製做技術日益精進，致使人們難以甄別真膠和偽膠。換言之，歷代本草書和方書記錄了不同時期人們對阿膠的觀察，以及認知上的省思，致使文本之間既存在傳抄，也存有質疑。

本草方書中辨識真偽阿膠的文字敘述，亦往往涉及視覺、嗅覺、觸覺等人類的主觀感知，此類文本或可謂描繪人類感官的重要利器和媒介。文本中「真膠明澈如冰、黃透如琥珀色、光黑如豎漆」、「偽膠枯黯似墨」、「偽膠加入馬料等來增

98（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臺北：旋風出版社，1978），卷9，〈獸部·浙驢皮膠〉，頁458-459。

99 轉引自趙佳琛等，〈經典名方中阿膠的本草考證〉，頁322。

加其黑色色澤」等論述，牽涉視覺感知。「真膠不作皮臭」、「偽膠氣味濁臭」以及「偽膠加上樟腦等調整阿膠的氣味」等描述，關聯到嗅覺感知。「真膠質脆易斷」與「偽膠質軟難敲」，則涉及觸覺感知。人們對於感官的理解多種多樣，有時是一種表達，有時是一種評論；而且，每一種感官皆有其獨特性，不僅能夠被表述，亦能夠被感知。這類感知多經由仔細觀察、經驗累積而來，且以文字形式被描述、記錄下來，隨著時間聚集並轉化成甄別真膠和偽膠的重要判準，進而形成一種辨藥知識的傳統。

六、結論

阿膠因為「無毒」、「輕身益氣」等特性，被列在上品藥之列。歷代本草書和方書記錄了不同時期人們對阿膠的觀察以及認知上的省思，當中包括：製膠原料從牛皮到驢皮，尤其是以黑驢皮為佳的原因與過程，以及使用東阿阿井水製做阿膠的道地問題。不僅如此，本草方書中辨識真偽阿膠的文字敘述，往往涉及視覺、嗅覺、觸覺等人類的主觀感知，這類感知時常被當作甄別真膠和偽膠的重要判準，且降至明清時期，相關論述更為細緻化。大體而論，這些文本記述，它們彼此之間既相互傳抄，亦相互質疑，甚至出現挪用、複寫進而形塑自己是論述原創者的現象。

綜觀歷代本草方書論述黑驢皮、阿井水等製膠要素的選擇原因及其對應的療效時，主張「煎膠用皮者，取其發散皮膚之外」、「取其水色，蓋以制其熱則生風之義」、「取黑以走腎」、「水入腎」、「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阿井生東方，取其天一生水」，亦強調「阿膠得阿井純陰之水」、「(狼溪)性陽，阿井水性陰」以及「人之血脈，宜伏而不宜見，宜沉而不宜浮，以之製膠，正與血脈相宜」。這些論述，可以分別從模擬比類與陰陽五行學說兩個方面來理解。

將模擬比類這種思維方式運用在藥物療效的解釋，起源甚早，在《黃帝內經》中就可見端倪；且唐宋時期藥物學的發展，亦有賴於這種思維方式被進一步廣泛地運用。在此脈絡下，宋代本草文本——《本草衍義》「煎膠用皮者，取其發散皮膚之外」的記載，將自然界中的動物與人相比類；《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援引《夢溪筆談》「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的記述，把自然界中的現象，轉化為象徵意象，並取此種意象來闡釋阿膠的製做。爾後，明代陳

士鐸「生東方」和「天一生水」的阿井解釋模式，更是將《周易》的觀念與內涵納入其中，視阿井水為宇宙天地萬物形成之始的象徵，強化了阿膠「始生」的象徵意義，將宇宙運行的規律，運用在阿膠製做的解釋上。清代《神農本草經讀》將濟水流於地面之下的特徵，類比人之血脈「宜伏不宜見」、「宜沉不宜浮」的性質，以此說明用阿井水煎煮製成的阿膠，適合用作血脈之藥的原因。

就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在阿膠的解釋而論，梁朝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受到當時講究實用之學術風尚的影響，並未特別強調「黑」驢皮，亦未從陰陽五行理論來解釋阿膠的功效。相較之下，宋代本草文本，諸如《本草圖經》、《本草衍義》等，受到當時醫家對理論有濃厚興趣的影響，將漢代醫學經典中的五行學說作為解釋阿膠功效的理論基礎，特別強調「取其水色，蓋以制其熱則生風之義」以及「取黑以走腎」，視「黑」驢皮為重要的製膠元素，並透過五色和五行的對應關係，以及五行之中的相剋規律解釋煎膠必用黑驢皮的原因。儘管到了明代，陳士鐸在《本草新編》一書中指出，山東東阿縣的阿井水與驢皮本身才是製膠的重點，且水原本即入腎，故不須特別取黑，前人因「取黑以走腎」而崇尚黑驢，實為多此一舉。但是，其論述仍然不脫離五行學說的解釋模式。爾後，清代《本草求真》強調「阿膠得阿井純陰之水」，《本草崇原》則藉由狼溪「性陽」與阿井水為「純陰之水」的物性，說明必須先將製膠之皮浸泡在狼溪水的原因，兩者皆是運用陰陽學說及其互變定律闡釋阿膠的製做。

由前述可知，關於阿膠藥性與功效的描述，並非一開始即用模擬比類與陰陽五行學說來解釋，而是有其發展和變化的過程，且不同階段的論述，各有其重點與特色，先前有關阿膠的研究討論，似乎並未注意到這一點。然而，如果沿著「科學」的軌跡去思索前面的論述，很可能將永無答案。但若我們能對古代的思維方式有所了解，便不難對這一切做出合理的解釋：古人討論黑驢皮、阿井水等製膠要素時，並非從藥物所含的成分、歸經與臟腑辯證理論分析解釋，而是從自然宇宙論的角度切入探討，其背後實涉人體小宇宙與自然大宇宙之間的對應與穩定關係。上述阿膠的論述方式，反映了《聖濟經·藥理篇》以降藥物「法象」的論述傳統。「法象」指的是藥物的外部現象，當中既包括藥物的外形、顏色等外部特徵，亦涉及自然萬物之間的克制關係。藥物「法象」的論述，著眼於由比類而產生的各種思維聯想，其內容常隨不同時代的文化薰染而有所變更，從而使中藥藥

理具有很強大的人文特徵，此即鄭金生所謂的「文化藥理」。¹⁰⁰無獨有偶，廖育群亦認為自然萬物的藥用功效，可由一些基本的抽象原理而獲知。除了實踐經驗之外，模擬、聯想與比類可說是古代建立藥效之說的最重途徑之一，這種思維方式，即古代醫者所謂的「意」。¹⁰¹本文關於阿膠的討論，正可與之相互呼應。本草方書不僅將古人用以闡釋宇宙萬物的學說，套用於阿膠的解釋上，亦將自然界中的現象，轉化為象徵意象，並取此種意象來闡釋阿膠的製做，將阿膠認知與宇宙論聯繫在一起。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宋代以來，本草文本運用模擬比類與陰陽五行學說，解釋黑驢皮、阿井水等製膠要素的選擇原因及其對應的療效之後，對此藥物的使用究竟造成何種影響？爬梳明清醫案，當中鮮少有醫者實際運用阿膠時，強調一定要用黑驢皮、阿井水製做而成之阿膠的記錄。目前僅見清代江蘇名醫葉天士（1667-1746）《臨證指南醫案》記載他治療某女子經漏時，所開藥方中提到「阿膠得濟水沉伏，味鹹色黑，熄肝風，養腎水」。¹⁰²再就類書、筆記文集等記載來看，相關記述仍寥寥可數，且多與實際治療無涉。如：明人楊慎（1488-1559）於《丹鉛續錄》考辨諸書異同時，述及「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濁住吐，下膈踈痰，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於濁逆上之病」；清人金埴（1663-1740）《巾箱說》談到製膠方法時提到「選純黑驢，飲以東阿城內狼溪河之水」。¹⁰³其他類書或筆記文集論及阿膠製做時，幾乎完全不涉及黑驢皮和阿井水，而是強調「揀明淨好者，剉成小塊，以蛤粉先入鍋炒熱卻下」。¹⁰⁴由此觀之，透過模擬比類與陰陽五行學說解釋黑驢皮、阿井水等製膠要素，很有可能僅是宋代以降本草學家的一種宣稱和論述方式，後來被部分筆記文集承襲；然醫者實際使用阿膠治療疾病時，則未必依然注重此原理原則。

100 鄭金生，《藥林外史》，頁 54-55。

101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頁 48、50。

102（清）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卷 9，〈崩漏·奇脉陰虛風陽動〉，頁 32。

103（明）楊慎，《丹鉛續錄》，收入（明）陳繼儒編，《寶顏堂秘笈廣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齋刻本），卷 3，〈別味〉，頁 5；（清）金埴，《巾箱說》，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38。

104《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壬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衛生·治諸病經驗方·勞瘵證諸方·黃芪劫勞〉，頁 366。

近年來，動物史研究方興未艾，研究者紛紛聚焦於歷史上人與動物之間的互動與共生關係，強調動物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然而，當中關於「動物」藥的研究，尚未受到足夠重視。目前學界對於個別藥物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如：大黃、龍骨、牛黃、檳榔、當歸、人藥、人參等，但其中僅有龍骨、牛黃、人藥三項屬於動物藥。¹⁰⁵ 儘管最近有學者開始致力於海馬、蛤蚧以及鹿茸的討論，但有關動物藥的研究，仍相對稍嫌不足。¹⁰⁶ 將阿膠放在動物史研究的脈絡下來看，本文或可補充此尚未受到學界關注的面向。惟如欲領會傳統中國如何思考動物及其相關問題，必須先設法揭示傳統中國對動物事實的建構，究竟是受到哪些具體文化因素的影響。¹⁰⁷ 透過本文的討論可知，本草學家藉由模擬比類與陰陽五行學說等思想文化元素，以宇宙自然中的現象和運行法則來類比、解釋驢藥阿膠的製做；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驢在本草知識創建的過程中，有時也充當象徵和隱喻。面對驢，本草學家經過選擇後，將相關論述寫進本草文本之中。因此，本草文本關於驢作為藥物的記載，一方面包含了驢的信息，一方面也透露了人類的關切。惟驢無論作為解釋對象或是象徵和隱喻，相關論述皆融匯到一種人獸相通而籠罩萬物的結構當中，進而形成阿膠甚至是驢藥的論述傳統。

105 相關研究可參見：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對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期（2005.3），頁43-100；陳元朋，〈「生不可得見」的「有形之物」——中藥材龍骨的認知變遷與使用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本3分（2017.9），頁397-451；陳元朋，〈中藥材牛黃的生產歷史及其本草藥圖所涉及的知識結構〉，《故宮學術季刊》，36卷4期（2019.12），頁35-60；林富士，〈試論影響食品安全的文化因素：以嚼食檳榔為例〉，《中國飲食文化》，10卷1期（2014.4），頁43-104；林富士，〈檳榔與佛教——以漢文文獻為主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本3分（2017.9），頁453-519；林富士，〈中國隋唐五代時期的檳榔文化〉，《新史學》，29卷2期（2018.6），頁1-61；李貞德，〈女人要藥考——當歸的醫療文化史試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本3分（2017.9），頁521-588；李貞德，〈讀《李朝實錄》關於「當歸」的史料〉，收入陳明主編，《跨越邊際的古代東方醫學》（上海：中西書局，2023），頁144-183；陳秀芬，〈從人到物：《本草綱目·人部》的人體論述與人藥製做〉，頁589-641；陳秀芬，〈食物、藥物與穢物——明代胎盤的物質文化史考察〉，《中國史學》，31卷（2021.10），頁95-108；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106 相關研究可參見曾齡儀，〈從「難產」到「壯陽」——戰後臺灣「海馬」中藥消費文化〉，收入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頁83-107；郭忠豪，〈補肺氣與益陽道——戰後臺灣的蛤蚧食療與消費初探〉，收入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頁109-128；王士銘，〈清代蒙古鹿茸貿易初探〉，收入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頁153-184。

107 胡司德（Roel Sterckx），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頁6。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 鄭元注，(唐) 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漢) 張仲景撰，(晉) 王叔和編，(金) 成無己注，《注解傷寒論》，收入《古今醫統正脈全書》，冊5，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 (後魏) 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
- (梁) 陶弘景編，尙志鈞、尙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 (唐) 孫思邈，《備急千金方》，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
- (唐) 蘇敬，《新修本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宋)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 沈括，《夢溪筆談校證·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宋) 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宋版。
- (宋) 唐慎微撰，寇宗奭衍義，《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晦明軒刊本。
- (宋) 寇宗奭，《本草衍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宋) 陳自明，《新編婦人大全良方》，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日本傳鈔朝鮮活字本。
- (宋)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 (明) 王圻，《三才圖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
- (明) 李中梓，《雷公炮製藥性解》，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3。
- (明)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
- (明) 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 (明) 周履靖輯刊，《夷門廣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金陵荊山書林刊配補影鈔本。
- (明) 倪朱謨，《本草彙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 (明) 陳士鐸，《本草新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
- (明) 陳嘉謨，《本草蒙筌》，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
- (明) 張介賓，《類經附翼》，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會稽張氏原刊本。
- (明) 張萱，《西園聞見錄·外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1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 楊慎，《丹鉛續錄》，收入(明) 陳繼儒編，《寶顏堂秘笈廣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尙白齋刻本。
- (明) 劉文泰等撰，《本草彙精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
- (明) 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臺北：臺灣商務，1986。
- (明) 盧和，《食物本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隆慶四年一樂堂重刊本。
- (明) 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 (清) 王如鑒，《本草約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稿本。
- (清) 汪紱，《醫林纂要探源》，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
- (清) 李斗，《揚州畫舫錄》，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清)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周易兼義》，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清) 金埴，《巾箱說》，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 張志聰，《本草崇原》，收入鄭林主編，《張志聰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 (清) 張璐，《本經逢原》，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
- (清) 陳修園，《神農本草經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檳嶼書屋刻本。
- (清) 閔鉞，《本草詳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康熙二十年默堂主人刻本。
- (清) 黃宮綉，《本草求真》，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
- (清) 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
- (清) 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臺北：旋風出版社，1978。
- (清) 劉若金，《本草述》，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十五年還讀山房刊光緒二年姑蘇來青閣印本。
- (清) 諸仁安，《營口雜記》，收入(清) 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光緒三年至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
- (清) 魯照，《串雅補》，收入《中華醫書集成》，冊 9，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
- 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6。

二、近代論著

- 丁振國、張淨秋，〈《神農本草經》成書考〉，《中醫藥文化》，2023年5期，頁434-452。
- 山田慶兒，〈《物類相感志》的產生及其思考方法〉，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125-139。
- 王士銘，〈清代蒙古鹿茸貿易初探〉，收入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臺北：前衛出版社，2023，頁153-184。
- 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汪培基等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
- 朱伯崑，《易學漫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 吳亞蘭、許霞，〈膠劑的歷史發展〉，《中醫藥臨床雜誌》，2018年5期，頁870-872。
- 李貞德，〈女人要藥考——當歸的醫療文化史試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本3分，2017年9月，頁521-588。
- 李貞德，〈讀《李朝實錄》關於「當歸」的史料〉，收入陳明主編，《跨越邊際的古代東方醫學》，上海：中西書局，2023，頁144-183。
- 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北京：三聯書店，1957。
- 林富士，〈試論影響食品安全的文化因素：以嚼食檳榔為例〉，《中國飲食文化》，10卷1期，2014年4月，頁43-104。
- 林富士，〈檳榔與佛教——以漢文文獻為主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本3分，2017年9月，頁453-519。
- 林富士，〈中國隋唐五代時期的檳榔文化〉，《新史學》，29卷2期，2018年6月，頁1-61。
- 武晉、王永生編著，《周易百題問答——周易與中醫氣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 胡司德（Roel Sterckx），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 唐廷猷，《中國藥業史》，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1。
- 徐敏華、陳潮宗、蘇振隆、翁清松，〈中草藥結合明膠應用於敷材之研究〉，《先進工程學刊》，5期，2015年1月，頁27-35。
- 祝平一，〈醫藥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8期，2010年6月，頁1-50。
- 祝平一，〈作者、編者、剽竊者：從《晰微補化全書》看醫書的抄輯與作者身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本1分，2021年9月，頁561-602。
-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 張金聚等，〈阿膠歷史沿革考〉，《中國中藥雜誌》，2020年10期，頁2465-2468。

- 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對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期，2005年3月，頁43-100。
- 郭忠豪，〈補肺氣與益陽道——戰後臺灣的蛤蚧食療與消費初探〉，收入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臺北：前衛出版社，2023，頁109-128。
- 陳元朋，〈「生不可得見」的「有形之物」——中藥材龍骨的認知變遷與使用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本3分，2017年9月，頁397-451。
- 陳元朋，〈中藥材牛黃的生產歷史及其本草藥圖所涉及的知識結構〉，《故宮學術季刊》，36卷4期，2019年12月，頁35-60。
- 陳秀芬，〈從人到物：《本草綱目·人部》的人體論述與人藥製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本3分，2017年9月，頁589-641。
- 陳秀芬，〈食物、藥物與穢物——明代胎盤的物質文化史考察〉，《中國史學》，31卷，2021年10月，頁95-108。
- 曾齡儀，〈從「難產」到「壯陽」——戰後臺灣「海馬」中藥消費文化〉，收入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臺北：前衛出版社，2023，頁83-107。
- 黃璐琦等著，《道地藥材理論與文獻研究》，臺北：文光圖書，2017。
-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素問譯解》，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4。
-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 趙佳琛等，〈經典名方中阿膠的本草考證〉，《中國實驗方劑學雜誌》，2022年10期，頁318-326。
- 劉世珣，〈以驢為藥——《本草綱目》中的驢藥論述〉，收入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臺北：前衛出版社，2023，頁55-82。
- 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 鄭丕留主編，《中國馬驢品種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
- 鄭金生，《藥林外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 魯春曉、劉勇，《東阿阿膠製做技藝產業化研究——基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 燕娜娜等，〈阿膠炮製歷史沿革與現代研究進展〉，《中藥材》，2018年12期，頁2948-2951。
- 賴錫三，〈《夢溪筆談》〈象數〉門中的「象數」與「環中」——論沈括的命理觀與象數觀〉，《政大中文學報》，10期，2008年12月，頁121-144。
- 董瑋瑋等，“Quality Control of Colla Corii Asini Using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Chemometrics Clustering Techniques”，《藥品食物分析》，20卷1期，2012年3月，頁154-160。

趙英傑等，“Authentication of Equine DNA from Highly Processed Donkey-Hide Glue (Colla Corii Asini) Using SINE Element”，《藥品食物分析》，19 卷 2 期，2011 年 6 月，頁 123-130。

Bian, He.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Frazer, J. G.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Köhle, Natalie. “Feasting on Donkey Skin.” In *Prosperity: China Story Yearbook 2017*, edited by Jane Golley and Linda Jaivin, 177-182. Act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Unschuld, Paul U.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網路資源

〈漢典·傳致〉，<https://www.zdic.net/hans/%E5%82%85%E8%87%B4>，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0 日。

The High-Level Donkey-Based Medicine: The Discourse on *Ejiao* in th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Liu, Shih-hsun**

Abstract

Mos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lassify medical substances derived from donkeys as low-grade in the section on animals. However, *ejiao* 阿膠 (also known as donkey-hide gelatin), which is one of the medicines derived from donkeys, is considered to be in a separate medicinal category and is classified as a high-level medical substance in the section on animals, for it is said to “lighten” the body and benefit the *qi* 氣 and is nonpoisonous, thereby holding a distinct position among Chinese medicines. Over the generations, Chinese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and prescription texts have recorded people’s observations and understanding of *ejiao*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discourse on its medicinal effects, and the gelatin manufacturing factors such as black donkey hide or *ejin* 阿井 water, is not based on its ingredients or theories such as Chinese herbal channel tropism 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organs. Rather, it is based on the aspect of cosmology, which involves concepts supposedly to heal or nourish a body part using something that is visually analogous to the respective body part to be treated. It also talks about the doctrine of *yin-yang* 陰陽, the Five Elements, Heaven-human interac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ternal world and internal self.

However, these discourses did not emerge in their current form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nstead, they evolved through distinct stages that can be clearly categorized. In addition, texts regarding how to identify the authenticity of *ejiao* in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and prescription texts involve the senses such as vision, smell, and touch. The senses have always been the key factor in identifying the authenticity of gelatin, and it has already become a kind of tradition in the knowledge of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By looking into all these texts regarding *ejiao*, it can be shown how they copied and questioned each other, even claiming themselves to be the authentic author of relevant theories. The application of analogy, the doctrine of *yin-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to elucidate the process of making gelatin was also likely a rhetorical strategy utilized by herbalis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afterwards.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healers had to adhere to these principles when using *ejiao* to treat diseases.

Keywords: *ejiao*, black donkey hide, *ejin* water, authentic gelatin, fake gelatin

* Received: 11 September, 2023; Accepted: 3 May, 2024

** Assistant Curator, Department of Painting, Calligraphy,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